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

论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

论中国传统文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曹月堂

封面设计：宁成春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

论中国传统文化

LUN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366,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7002·102 定价 3.20元

ISBN 7-108-00033-4/G·5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汤一介

主编：李中华 张文定

编委：王守常 田志远 李中华 汤一介

林 娅 陈战国 张文定 葛增福

鲁 军 魏常海

DA52/21
目 录

序言	汤一介 (1)
• 试谈中国的智慧	李泽厚 (18)
•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	
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汤一介 (44)
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问题	庞 朴 (70)
• 儒家哲学与现代化	杜维明 (97)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 (134)
• 中国哲学的特质	冯友兰 (139)
比较文化研究问题	金克木 (152)
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概况	杜维明 (171)
易学与中国文化	朱伯崑 (204)
经学与中国文化	孙长江 (222)
佛教与中国文化	石 峻 (236)
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	任继愈 (257)
• 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	陈鼓应 (268)
• 魏晋南北朝的儒学	何兹全 (311)
清代思潮	戴 逸 (317)
中国近代思潮	丁守和 (332)
藏学与汉学	牙含章 (372)
智慧的结晶 文明的奇迹	
——漫谈中国语文	袁晓园 (387)

《金瓶梅》的艺术特点	吴晓铃 (408)
外来文化输入史研究	鲁 军 (421)
中国传统地理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侯仁之 (443)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	阴法鲁 (461)
汉字的书法艺术	虞 愚 (478)
编者后记	(484)

序 言

汤 一 介

中国文化书院自一九八四年成立以来，举办了四期有关文化问题的讲习班，这类讲习班还将继续举办下去。为了使讲习班所涉及的内容让更多的同志和朋友了解，现在我们把各期讲习班的讲演内容整理成文字，分册出版。

当前，国内外许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这一情况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有我国国内的原因，而且也有国外的原因。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在纵横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这个大时代的迫切要求。

就纵的方面而言，也就是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我国正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化的口号提出了半个多世纪，而现代化的进程却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是什么原因？看来也许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现代化不能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等等。“现代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就说明我们仍处在“非现代化”的历史时期。那么首先有一个“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其间就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在现代化问题上不能取捷径，不能仅仅在自然科学方法等文化问题上作文章，而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对文化深层的内容作深入的

研究。回顾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提出“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来，就存在着一个所谓“古今中外”之争。“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争论从“五四”运动前后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问题没有解决，后来竟搁置起来了。这里面是否有一个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混淆的问题。看来，“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都是不对的，都无益于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的纵线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估价，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等问题，被人们提了出来。

就横的方面来看，香港的回归问题，使我国面临一国两制的现实。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并存于一个国家，如何可能长久、稳定地保持下去，这就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能对此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发展的处理，需不需要有一个观念形态上的基础？如果对此问题作否定的回答，那么对此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发展的处理将如何得到保证？如果需要一个观念形态上的基础，那么看来只能到某种共同的文化层面中去寻找。这就涉及到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要把握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不仅要当前文化问题作认真研究，同样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

正因为在这纵横交叉点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放在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中来分析，将使我们更加了解其时代意义。就全世界范围看，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意识，一是“全球意识”，一是“寻根意识”或叫“民族意识”。

从前一方面看，由于全世界成了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整体，全世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是共同的。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发生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密切关系。知识和信息的迅速传递，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很快就会得到传播。因此，对

“文化”的发展没有一个全球眼光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随时了解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正因为这种交流，各种学说、思想、文化的互相影响也就会加强起来，所以就全世界范围看，文化的发展有着一种“综合”的趋势。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能不考虑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不去努力解决现实世界对人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但另一方面，“寻根意识”（“民族意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自觉和民族独立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要求发展自己，就要求寻找自己的文化传统，因而这种“寻根意识”也就发展起来。例如，马来西亚为了强调它的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这种本来无书写文字的口头语便应运而生，不仅在马来西亚，而且有成为东南亚一种重要的通行语言文字的趋势。以色列为了建国，决定恢复只有在宗教仪式中才使用的希伯来文作为日常通行语言，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希伯来语不仅已成为耶路撒冷大街小巷中生活的工具，而且也逐渐成为美国纽约犹太人追寻文化根源的凭借。文学作品也表现出这样的现象，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学都在努力表现本民族的特色。继一九八二年南美哥伦比亚小说家马奎斯之后，今年非洲尼日利亚作家索英卡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马奎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就美洲地区的文化发展问题回答记者问时说：“我认为拉丁美洲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唯一有主动创造力的地区。巴西的电话复兴，哥伦比亚的戏剧运动，都受到全世界注意。同样的拉丁美洲文学也是当代的最佳文学。当然，日本、德国、美国都有很好的作家，然而他们并不是我们这么重要的一股力量里的一部分。”非洲作家索英卡的作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之所以十分深刻，就在于他有独特的风格，有浓厚的非洲气息。一位西方评论家说：“没有一个非洲作家比索英卡更为成功地让世界上其他人用非洲的眼光来看

人类。”这说明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我想，这样一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看起来也不大可能是短暂的现象。这种“全球意识”，即从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方向来看文化的发展，和“寻根意识”，即要求发挥民族文化的特色，这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矛盾，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全球意义”，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反映这个时代的要求，就要游离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轨道之外，这样的文化不可能有生命力。但是，如果没有“寻根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来，没有特色的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总是有限的。所以我想，今日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有长久文化传统的大国的文化的发展，一定要把这两种意识很好的结合起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

根据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可以说，世界文化的发展，在破除了“欧洲中心论”之后，有着一个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的倾向，在这种多元化文化发展的游离中，世界的总体文化才可能是丰富多采的。为了论证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在西方有几个问题已为大家所关心。（1）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近年考古的新发现越来越多的材料可以证明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2）围绕着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一八八三——一九六九）“轴心时代”观念的讨论，说明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了许多大思想家，他们都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作了反思，由于反思的路径不同，所表现的精神文明的形式也大不相同。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化都是独立发展的，没有互相影响，所以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似乎从来如此。（3）由于对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一八六四——一九二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所引发出来关于现代化模式的多样化与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的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正是在破除了“欧洲中心论”之后，

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全球意识”下要求发展自己文化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有着一一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趋势。为什么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呢?据了解,除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文化的发展不能不受到重视外,可能和下述情况有关:

(一)东亚工业的兴起,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速度有超过西方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一个模式,但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已被逐步打破。东亚地区经济和技术的腾飞出现了不同于西欧美国和东欧苏联的第三种现代化模式。一些学者认为,是否有一种东方企业精神在支配着东亚一些地区的工业、经济的发展。他们说,东亚地区这种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坚实内核,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则东方文化的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曾说:“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而且是东亚的精神文明。”一九八三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会议主席蒙特利尔大学校长(现任世界哲学联合会主席)高启(C·Cauchy)教授说:“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间,由于西方的技术经济占尽优势,所以在哲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就自居先进地位。但如今东方的技术经济已经赶上来了,甚至有凌驾西方的趋势,现在该是西方觉醒虚心向东方智慧学习的时候。”加拿大另一位哲学家金·法罗(King Farlow)说:“如今应该重新重视东方统一与和谐的智慧。”有的学者分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在后工业化的时代,在一个企业内部重视和谐,重视集体的作用和人际关系,就能加强一个企业的外部竞争力,而这种重视内部和谐的精神正是东方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点。当然是否能作这样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还得进一步研究,更需要较长时期的实践来证明。

(二)当代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的盛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人文主义特征形成了文化上的交叉点。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促使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一种发展的趋势，有所谓“基督教入学”的产生。他们认为，虽然“上帝”是基督教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但是也许“人”本身才是人们要注意研究的更重要的问题。他们往往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学等等方面来研究基督教的本质。因此，关于“人”的价值问题就突出起来；由于“人的价值”问题的突出就不得不涉及人们的伦理道德问题，于是有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就提出在基督教伦理与中国儒家伦理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合点，能否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些对话的基础。例如英国历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大师查理斯·霍桑（Charles Herrshorne）教授，现已年过八十，他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他特别欣赏中国哲学像孟子那样没有把头脑打成两片，认为思想和感情是不可分的，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但总有限制，计算机不能感（没有感情）也不能思（不能独立思维），它的动作不能与活生生的人类行为混为一谈。

（三）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迫使人们企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补救的良药。随着科学的高速发展，作为征服自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中，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的失落感日甚，由此导致人们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在这种寻求中，东方文化的和谐色彩和温馨气氛，无疑从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吸引力。国际现象学会会长、女哲学家田緬聂卡（Tymincka）在第十七届哲学大会上说：“西方常常在不知不觉受惠于东方而不自觉，象莱布尼兹之重视普遍和谐观念就是一例。”她甚至认为，当前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幸运，没有走上西方哲学目前分崩离析的道路，当前西方至少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第一，崇尚自然（和谐）；第二，体证生生（生生不息）；第三，德性实

践。她还认为,西方文化必须自求多福,浮泛地向东方学一点东西来充门面是不行的,因此文化间的对话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分析哲学虽仍占有一定优势,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价值论等等方面排斥在哲学以外很不满意。欧洲大陆的哲学也不断地传到美国,但常常是不几年就成为过去。存在主义不仅在欧洲走了下坡路,在美国也不时兴了,现象学曾流行了一段时间,现在也不景气;结构主义流行不几年,又出现了对它否定的“解结构主义”。特别是近两年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逐渐由分析哲学转向伦理学,也许这是美国哲学界将要转向人文主义的标志。人文主义的抬头,就有更多的可能与东方哲学对话。

(四)科学的发展,西方在转变着他们的某些思维方式,促进了他们对东方文化、中国哲学的兴趣。看来,西方的人文科学的学者比较重视儒家学说,而一些自然科学家则对道家思想更感兴趣。在《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介绍了一些西方大科学家说他们自己的某些科学思想可以从东方找到根据。例如大科学家玻尔认为,原子理论在方法论问题上是道家老子这样一些思想家早就遇到过的问题。可能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这一说法并不合适,也许说“现代物理学与东方思维方式”更为妥当。前些年出版的卡普洛(Fritzaf Capra)写的《物理学之道》(Tao of physics)中说:“东方世界观的基本成分,也就是现代物理学世界观的基本成分。……关于这种观念的基本论点是以为所有现象的统一性和宇宙有内在的能动性。我们对于亚微观世界看得越透,我们就会越加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物理学家象东方神秘主义者一样,怎样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具有不可分割的、互相作用的、不断运动的组件的系统,而人也是这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因此,东方哲学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它们最近在西方得到盛名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神秘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思

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物理学的观念相合了。关于这个问题应如何看，需要我们进一步来研究。但目前西方研究《老子》、《易经》甚至禅宗的书很不少，说什么“元气论”可以成为“量子场论”的基础，《易经》的二进制和计算机原理相合，它的六十四卦可以解释生物密码等等。这些说法，很可能是牵强附会，很少科学性。

我们说，西方一些学者对东方文化，中国哲学的兴趣有着发展的趋势，但决不能认为东方思想真在西方有很大影响，更不能认为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不过有一点可以注意，西方的一些学者也许正是有识之士，他们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希望从东方文化中得到某种补救，以便他们的文化能够更好的发展，而继续在上世界上起主导作用，这是东方的学者应该认真对付的。要使中国文化在上世界上占领先地位，这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也许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前进，这样我们就必须看到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到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现实状况。这就是说，在这种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形势中，在东方文化、中国哲学受到一定程度重视的条件下，中国文化应如何发展，当前面临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要我们解决：（1）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作出积极的回应；（2）马克思主义怎样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怎样从总体上对待传统文化。

（1）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作出积极的回应。

对待当前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以有两种，一是消极的回应，一是积极的回应。从一九四九年起到一九七九年三中全会前，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大体上是消极的回应，采取了“闭关自守”的办法，致使我们在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进步。因此，对西方文化采取消极态

度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当前所实行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方针。要对西方文化作出积极的回应，必须解决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要正确认识西方文化。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的方法等等，但也必须引进西方文化中其他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部分。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将仍然是走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是行不通的。由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他们的某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是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我们不能全然拒绝。“五四”运动时的口号，要求“科学与民主”，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如果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那就是“全盘西化”，这也是行不通的。“五四”运动后某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富强，解放后的“全面学习苏联”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顺利发展。

第二，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要有两个条件：即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世界的形势在发展，中国的形势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发展，必须随时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新的哲学思想，使之成为一真正的开放性的思想体系。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草稿片断》中说：“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体系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也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要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仅要了解它对我们现代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以便我们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为现代化服务。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的情况下，一个民族也应有一个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这样才可以更好

地吸收和融合外来的西方文化,创造出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文化。这两个方面,即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能产生积极作用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就能够成为我们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的根本条件。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2)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我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毛泽东同志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到今天仍然是正确的。但是这项工作在解放以前由于忙于战争,没有条件来很好实现,解放后又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因此,今天我们仍然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能起积极作用的方面相结合,这也许许多人可以同意的,但是如何结合则是个问题。关于如何结合的问题也许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考虑,例如,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找某些结合点;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中找到某些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用中国传统思想中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的方面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等等。象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应深入研究,不是由一两个例证可以解决的,应该从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揭示的发展规律中找到如何结合的途径。由此,我们就必须对中国思想、哲学、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3)怎样从总体上对待传统文化。

对待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着一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人们总希望比较简单明确地提出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哪些是好的,是对我

们今天甚至是将来有用和有利的；哪些是坏的，是对我们今天无用和不利的。但事情也许并非如此，而常常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优点和缺点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并不能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直接就拿来为现代化所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曾经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性。这种特殊的心理特性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即使今天它也还在不少方面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而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状态，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所在，也表现了它的缺点所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凝聚成的果实曾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民族，它们大体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我们对这些思想文化应如何具体分析，用“现代化”的要求来看这些思想文化的作用究竟如何，是值得我們认真考虑的。

(1) 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理想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孔子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追求着“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理想政治。后来儒家把它发展成一套“大同世界”的理想，并且要求通过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这一理想。道家的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并希望通过“无为”政治来使之实现。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有一个理想，大同世界的理想，天下太平的理想。有的皇帝自称“太平皇帝”，年号叫什么“太平真君”（魏太武帝），“太平兴国”（宋太宗）等等。农民革命也是如此，黄巾军出自“太平道”，宋代农民革命则以“杀尽不平享太平”相号召，近代则有“太平天国”，这些都是非常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大多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积极的热诚态度，企图把他们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想实现于现实社会，来转化现实的政治，但结果不仅不